

科学与人文研究丛书

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Ulrich Beck

FengXian SheHui LiLun JiQiDui ZhongGuo De YingXiang

林丹 著



人民出版社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 社会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林 丹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陈寒节

责任校对:湖 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林丹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2

(科学与人文研究丛书)

ISBN 978-7-01-012855-9

I. ①乌… II. ①林… III. ①贝克,U. - 社会学 - 研究
IV. ①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5826 号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Ulrich Beck FENGXIAN SHEHUI

LILUN JIQIDUI ZHONGGUO DE YINGXIANG

林 丹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7.25

字数:245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7-01-012855-9 定价:35.00 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本书由

大连市人民政府资助出版

The published book is sponsored by the Dalian Municipal Government

2010 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最
成果

2011 年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项目阶
性成果

《科学与人文研究丛书》

编委会

顾问 刘则渊

主编 洪晓楠

副主编 王 前 丁 堃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 堃	文成伟	王子彦	王 前
王国豫	王续琨	刘乃仲	刘元芳
刘艺工	刘鸿鹤	张志刚	张学昕
杨连生	迟景明	郑保章	姜青春
洪晓楠	费艳颖	蔡小慎	

《科学与人文研究丛书》总序

科学和人文是一对孪生兄妹,两者可以说是“相融是利,相离则是‘半个人’”(杨叔子语)。

英文的 science 一词基本上指 natural science(自然科学),但 science 来自拉丁文 scientia,而后者涵义更广泛,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德文的 wissenschaft(科学)与拉丁文的 scientia 类似,含义较广,不仅指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我们知道德国人喜欢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科学”这个词,比如黑格尔讲哲学科学、狄尔泰讲精神科学、李凯尔特讲文化科学等。这些词的历史性关联暗示了一个更深层更广泛的思想传统,狭义的自然“科学”只有在这个深广的思想传统之下才有可能出现和发展。从静态的观点看科学是一种认识成果,是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之前,科学是小规模的运动,主要是少数学者和哲人的个人活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才相继建立了一批大学和科学院。尤其 19 世纪以后,科学活动的规模空前扩展,科学的社会化和社会的科学化才迅速发展。到现在,科学活动不再是少数人进行的纯学术研究,而是由众多社会成员参加,对于整个社会而言,科学研究成为一种专门的社会事业、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独立部门。如今运用动态的观点把它看作是 人类进行社会实践的一种特殊形式,认识世界的一种过程,生产科学知识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科学技术能使人类认识未知世界,帮助人类提高认识能力,同时人的认识世界的预测能力更是全面提高,突出人的主体性,表现了科学认识的能动性。在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随着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它的地位不断提升,成为一种高尚的文化成就。早在 17~18 世纪,科

学就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因素,被纳入整个文化体系,发挥着重要的文化功能。到了19世纪中期,科学文化更是蓬勃发展,在某些人心目中,科学文化简直是文化的典范,代表着文化的未来。如今,在这个文化多元化的社会,科学文化是其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过程。社会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汇,对社会文化的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而且科学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受到其他文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如政治、民族的精神状态和文化传统。

英文的 Humanities 直接来源于拉丁文 Humanitas,而拉丁文 Humanitas 继承了希腊文 paideia 的意思,即对理想人性的培育、优雅艺术的教育和训练。公元2世纪罗马作家格利乌斯(Aulus Gellius)的一段话成了 Humanitas 的经典定义:

那些说拉丁语以及正确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并没有赋予 Humanitas 一词以一般以为具有的含义,即希腊人所谓的 philanthropia,一种一视同仁待人的友爱精神和善意。但是,他们赋予 humanitas 以希腊文 paideia 的意思,也就是我们所说的“eruditionem institutionemque in bonas artes”,或者“美优之艺的教育与训练”(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the liberal arts)。热切地渴望和追求这一切的人们,具有最高的人性。因为在所有动物中,只有人才追求这种知识,接受这种训练,因此,它被称作“Humanitas”或“Humanity”(人性)。^①

汉语的“人文”一词同样有这两方面的意思。最早出现“人文”一词的《易经·贲》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就是教化的意思。中国的人文教化同样一方面是强调人之为人的内修,另一方面是强调礼乐仪文等文化形式。那么人之为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一般认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思想把理想人性规定为“仁”,在孔子那里,仁者人也,人者仁也,两者互训互通。仁通过什么方式可以获得呢?克己复礼为仁!礼是实现仁的教化方式。

^① 参见吴国盛:《反思科学》,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33—34页。

人文学科一词来源于公元前 55 年,西塞罗在其《论雄辩家》一书中首先把 *humanties*(人之品质)列为辩论者的一项基本训练项目。后来经过希腊罗马修辞学学者的发挥,*humanitas* 就成了古典文科教育的基本大纲。再往后,由圣·奥古斯丁和其他教父们使之转为基督教服务,它又构成了中世纪基督教徒的基础教育,构成了称之为 *artes, bone artes*(“通艺”)或 *artes liberals*(“自由艺术”)的研究领域,其中包括数学技艺和语言艺术,也包括某些科学,历史学以及哲学。欧洲十五六世纪时期开始使用此词。原指同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以区别于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神学。后含义几经演变。狭义指拉丁文、希腊文、古典文学的研究,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法学、文艺学、伦理学、语言学等等。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大学仿照美国体制分为 3 个学院,其中的文学院教授的就是人文学,简称文科,以别于教授自然科学的理学院和教授社会学的法学院。

科学与人文都是社会文化现象,所以对它们的考察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和社会系统去孤立分析。科学与人文本来是统一的。在古希腊时代至欧洲中世纪科学和人文皆被包含于哲学之中,是处于一种相互包容、相互渗透的状态之中,当然,这种浑然未分的统一是由于科学和人文学科皆未分化的结果。近代以后,当人文学科从中世纪的神学解放出来,尤其是科学真正意义上从自然哲学中分离出来时,科学与人文真正走向独立。此阶段的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双向互动的主要特征,一方面表现为科学与人文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机制;另一方面表现为科学与人文之间相互对立,彼此竞争的互斥机制。人文运动把科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促进了科学的发展,科学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了人文主义的传播。用理性来对抗神学迷信,就是这一阶段科学与人文携手共进的重要目的之一。从 18 世纪中期开始,科学在西方已不仅仅是一种观点或学说了,它已是建制化的活动,已是最有权威性的实践。到 19 世纪下半叶,科学成为主旋律,几乎占领了整个知识领域,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人们相信只要掌握了科学就能给人类带来美好的未来。另外科学对社会系统的作用愈来愈大,成为推动社会系统进步的主要力量,从而导致在一定程度上把自然科学绝对化,产生

了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科学主义观,强调知识必须建立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只有经验的知识才是确实可靠的,即实证的。科学几乎成为衡量万物的尺度,即“判定什么存在或不存在的尺度”。科学主义的诞生不仅否定了宗教权威,而且动摇了以人的感性经验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人文知识体系。而这一时期人文精神对社会的影响日渐消退。科学与人文之间表现出逐渐分离的趋势。人文固守绝对价值目标,忽视通往这一理想境界的现实道路。

近代以来,科学探索与人文探索关注事物的角度、它们的知识系统、文化思维、问题域和观念系统等等不同,科学和人文处于分化,对峙状态,甚趋于紧张。另一原因是人为原因,这就是受现实的功利价值、经济效益驱使。在现代社会,随着实证科学和近代技术的兴起,人与自然之间发生了角色转换。由于社会制度的作用,自然界开始变成被人们操纵的对象和被人们利用的工具,人本身变成了中心。科学作为工具价值的一面和作为目的价值的一面出现了严重的背离,以致在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科学的异化现象,科学技术对大自然的征服,导致了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全球性问题的出现,把当代人类推向了严重的生存困境。科学成了统治人的外部强制力量,这种状况,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 20 世纪,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想家不是对科学本身的异己性进行批判,而是对科学本身进行拒斥,用人文世界拒斥科学世界,从根本上否定科学精神和理性精神,并用艺术精神和非理性主义来取而代之;而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思想家则把科学的人文价值从科学的价值中剥离出来,把科学理解为与人生存的意义完全无关的关于纯粹事实的科学,并进而用科学世界拒斥人文世界,科学与人文截然割裂。科学主义者突出强调的是科学和理性的重要性,强调要用科学的观点、方法和标准来审视别的文化,忽视或贬低人文文化的意义和价值;而人本主义者则突出强调艺术和非理性的重要性,强调要以“人”为本来审视一切文化,排斥和否定科学的意义和价值,于是,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分离和对立便进一步加深了。19 世纪末最接近于对“两种文化”的分野进行表述的,是标榜新康德主义的弗莱堡历史学派传人李

凯尔特,他提出了自然与文化、自然科学与历史的文化科学这两种基本对立。

自从实证主义产生之后,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分别日益明显。实证主义提出“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实际上就是要严格区别科学与形而上学,逻辑实证主义继承了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的传统,提出了分界问题,即科学与非科学、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分界。兹后这一问题成为科学哲学的一个主要问题被科学哲学家们广泛而激烈地争论。从总体上来看,自19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中叶,思想家们大都在论证两种文化的独特性,给它们划界。实际上,这无意中加深了两种文化的裂痕。自20世纪中叶之后,思想家们大多从揭露两种文化的分化的弊端出发,寻求弥合两种文化裂痕的途径和方式。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者同狭隘的实证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一样,从根本上无法看到科学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人本主义者只看到科学技术对人、自然和社会的负面影响,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直接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而看不到科学技术对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所起的巨大作用,因而看不到科学技术同人的生存、栖居、自由和发展的深刻的一致性。

由此可见,近代人文主义运动在近代前期带来了科学的发展,并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在近代后期,由于科学自身独立的发展,特别是科学的功利主义的应用,造成了科学与人文的相互排斥,相互分离。在某种意义上,无论是科学主义的悲剧还是悲观的科学虚无主义的误区,归根到底都是由于离开了科学与人文的整合所致。

从整个世界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古代的教育都十分重视人的素质的培养。但是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传统的人文教育逐渐被专业技术教育所取代。中国在19世纪后期开始学习西方,发展专业技术教育。在20世纪专业技术教育得到蓬勃发展。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深受原苏联的影响,文理分家,理工分校,专业面狭窄。我国的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法、经、社、农、医、工程

等主要学科中,理工科比例太大,造成畸形发展。人们在思想上重工轻农,重理轻文,重“硬科学”轻“软科学”,即便在文科中,人们又存在着重社会科学轻人文学科的倾向。

当前,对于理工科大学生来说,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尤其重要;对于文科大学生来讲,提高科学素养也是当务之急的问题。通过近十几年来的努力,人们已经逐渐形成了“大”文化素质教育观。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要相融,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要相融,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要相融。相融则利,相离则弊。科学素质、科学精神,人文素质、人文精神就是在科学知识、人文知识中形而下的东西,经过人的努力,特别是经过人的实践,在实践中深思,在实践中体悟,在实践中磨炼,内化升华,形成形而上的精神世界的东西。科学精神也是人文精神。精神就是人文的东西,所以科学精神就是求真的人文精神;而人文精神,就是应以“实事求是”作为其基础的求善精神,从这一角度讲,就是求善的科学精神。科学与人文都有共同的追求。科学追求真,人文追求善,两者结合,保证追求正确,保证结果可以完美。这就是追求真善美高度的统一,而这种统一是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真善美都是围绕着要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新的明天。一个正确的思想,一个创造性的思想,必定是逻辑思维同形象思维、科学技术思维跟人文艺术思维的高度的统一。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自1999年成立以来,学院的发展得到了学校领导以及学界同仁、社会各界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经过10年的努力,学院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基本实现了三个方面的转变:在教学上,由以“两课”为主的教学工作向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导、文化素质教育为基础、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教育快速发展模式的转变;在人才培养上,由专本科和短期培训为主向本科生、研究生培养为主转变;在教学与科研关系上,由教学主导型向学科建设为基础、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并重的模式转变。目前,随着学科快速发展的需要,学校在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中心的基础上,又组建了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的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正在按照“文理渗透、中西融汇、学研一体、博专结合”的理念,努力形成以文理工

管交叉渗透为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群。

2006年大连理工大学决定设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2007年就拿出112万专款用来支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同时决定以后每年拿出100万元作为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这可以说是学校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2009年学校又提出文科要入主流,这对我们来说,不仅是一种期待,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理所当然地要一马当先,提升我们的学科水平。基于此,我们在编辑出版“科技哲学与科技管理丛书”的同时,结合我们学院学科较多、覆盖面宽、涉及面广的特点,本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谐人文”的宗旨,编辑出版“科学与人文研究丛书”。这套丛书是一套跨越科学与人文两个研究领域的综合性丛书,具有基础性、交叉性、哲理性、现实性、综合性的特点,内容主要涵盖科学与人文综合研究的诸多方面。举凡涉及科学、人文及其关系的内容,均收入这套丛书。这套丛书是我校“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项目的内在组成部分,其中的著作或者是我们学院部分教师承担的各级各类研究课题的成果,或者是来自名校的年轻博士的博士论文。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持续不断的出版和若干年的努力,不仅进一步搞好我们的学科建设,形成我们的学科特色,而且为实现“文理渗透、中西融汇”,促进我国科学与人文的交融发展贡献我们微薄的力量。

洪晓楠

2009年8月8日于大连

序一

我第一次接触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作品大概是在2002年。那年我正在美国哈佛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我人虽在哈佛燕京学社,但是我关注的课题却是当代西方文化哲学研究的成果。我关心西方学者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维度,在哈佛大学“威德拿纪念图书馆”发现乌尔里希·贝克对现代性、风险社会反思的一些英译作品,心情异常兴奋。

2005年,林丹从东北大学保送到大连理工大学随我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参与了我主持的辽宁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专题研究》,本书的选题主要来源于此。同时,本书部分内容也是大连理工大学2007年研究生教改基金资助项目《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及其影响》教材的阶段性成果,如今已经出版。

2007年,林丹又以优异的成绩提前攻读博士研究生,当时选题就是在她的硕士论文基础上深化而成,2010年她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而今,她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经过修改完成的《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一书即将出版,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技术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信息化程度的快速提高,整个世界正在驶向一个不同于传统社会的风险社会。20世纪初英国著名科学家金斯(J. Jeans)表白:我们不再相信人类命运是善或恶的精神或玩弄阴谋的恶魔的玩偶。没有什么能阻碍我们再次将地球建成天堂——除非我们自己阻碍我们自己。科学时代的黎明业

已到来。我们已发现人类是他自己命运的主人,是他灵魂之舟的船长。他可以驶入险恶的地方,甚至和礁石相撞。社会现实是,海啸、SARS、AIDS、禽流感、疯牛症、金融风暴等一系列突发性危机的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和迅速扩散性都日益增强,超越了人类知识的预期和控制范围。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一书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部分:风险社会理论的分析构架,对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与分析;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和批判风险社会理论;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产生的影响及启示。

在第一部分,作者从哲学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风险与风险社会的内涵。所谓“风险”是具有一定危险的可能性、是没有发生的灾难,预示着可能面临的具有不确定性的危机状态和灾难性危险,这既是人们的一种主观预测,但是发生后又是一种客观事实。“社会风险”主要指由现代社会所造成的风险以及由这些风险带来的社会性的副作用。与风险相比,社会风险更能表现出现代社会中的风险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社会性和制度性特征。现代社会风险像一颗颗隐藏在工厂、实验室、发电厂、天然气储存罐中的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引爆;而生态破坏、贫困、战争和极权政治又迫使人们动用更多的“想象”才能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危险情境。“风险社会”是对在现代社会中不断出现的“社会风险”的地位、作用、可能性影响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概括,是对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进行反思和批判的一个独特视角。一句话,风险社会就是指全球化背景下社会进入的一种新的发展阶段,即由于人类的行为和决策所导致的全球性社会风险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社会形态,而且,各种各样全球性风险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着严重的威胁。

在《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的第二部分,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和批判风险社会理论,深刻理解和分析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世界风险社会,并从资本的视角分析风险社会的历史根源,从恩格斯的“合力论”透析风险社会的本质特征,从而运用马克思主义

的理论和方法对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进行批判和反思,指出了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贡献和局限性。现代人类之所以身陷险境,并不因为弱小,恰恰因为过分强大。人类的力量过分强大,是相对于人类道德和智慧之萎缩的强大,它们已不能有效约束和指导人类知识和力量的正确运用。我们所谓的文明社会,表面上看来是一个秩序井然,充满理性的世界,事实上,企图去理解现代风险的成因、结果和可能采取的预防措施,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而同样地,如何去判断风险的可接受程度,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如何使社会生活从形式理性、工具理性的极度演化中脱身出来,使世界不成为机器主宰、支配的世界?如何在工具本体之上生长出情感本体、心理本体,保存价值理性、田园牧歌和人间情味?强调人类精神应走向成熟,不意指在未来的文明社会中,所有人都有极高尚的道德,从而社会中再也没有罪恶,而只希望人们在基本物质需求的以满足的前提下,以追求精神价值的方式追求无限。总而言之,本书的理想追求是低调的,而不是乌托邦式的。

社会思潮的传播是一种文化传播,文化传播是有条件的。我们要研究社会思潮的传播,就不能不研究人的社会活动,研究人与人的关系及其所属的集团、组织和社会。社会思潮的传播归根到底是人的一种社会活动,是人在社会活动中对文化的分配和享受。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文化传播都是社会传播,都是人的社会活动过程,离开了社会关系,离开了人与人的交往,文化传播既不存在,也不能实现。这种社会性的文化传播,都是与思潮所处的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潮文化条件相联系的,它构成社会思潮传播的宏观机制,即种种促进或阻碍社会思潮传播的外部动力。另一方面,社会思潮并不像一般的信息传递过程那样简单,只是表现为“输入→过程→输出”的单一模式,而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由无数相互交错、相互作用的个人因素所形成的文化动力学过程。这种文化动力是人们按照不同的文化要求进行社会活动的精神力量。正因为如此,社会思潮的传播不仅受到社会集团意识的制约,也受个人社会心理、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社会个人是以何种认知方式、接受方式、顺应内化方式、承递传播方式来参与社会思潮传播的,这些构成社会思潮传播的微观机制,提供

了社会思潮传播的内驱力。研究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通过研究,比较全面系统地了解一个社会思潮产生的来龙去脉,分析其产生的时代背景、社会根源、理论渊源及其主要内容;二是分析这个社会思潮对中国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这是研究思潮比较困难的一个部分,也是我们关注社会思潮研究的一个重点。无论是哪一种目的,在我们研究的过程中都要运用唯物史观的主要观点,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角度来看,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一种社会思潮为什么产生?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段产生?为什么在这个国家产生?社会思潮的具体内容为什么是这种形态?从接受社会思潮或社会思潮产生的影响的角度来分析,按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我们可以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来判定一种社会思潮是否符合中国社会的需要以及需要的程度,反过来也影响着这个社会思潮对中国社会发展和人们的思想(积极或消极)影响的程度。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一书的第三部分,作者运用影响分析的方法,进一步就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产生的积极影响及消极影响进行了分析;同时,作者也探讨了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对当代社会和人们的启示。

作者首先提出,当代中国同贝克生活于其中的德国社会一样,都处于全球化进程中,也同西方社会一样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虽然这种社会转型的程度和内容等有所不同,但两者都面临着全球风险的考验。在这一巨大的变迁过程中,中国社会也正在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高风险社会。因此,贝克所阐明的“风险社会”,对于我们,也就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他者话语,而是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课题了。通过对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和剖析,我们从中可以获得深刻的启示,使我们充分认清中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及现存的社会风险,更有利于我们认识风险、理解风险、化解风险、超越风险。

另一方面,作者认为,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入,社会信息量急剧增长与迅速变化,增加了社会的复杂程度

和变化频率。各种新情况、新问题的不断出现,使当代青年面临着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的冲击。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快速传播,原有的理想信念教育方式,已经很难适应处在各种社会危机和风险冲击之下的当代社会和人的思想。因此,需要在人们面临多样选择、多重危机和风险、多种理想信念问题的冲击时,发挥先导性和超越性功能,做出符合规律的预测,对人的发展进行引导和帮助,使其充分发挥思想方面的优势和长处,对可能出现的危机和风险做出有效地预测和防范。

全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体现了作者具有较强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作者将复杂深奥的理论运用于对现实的分析 and 探讨之中,理论论述比较活泼生动,现实分析发人深省。全书从基本的哲学问题生发开来,并涉及到了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各个学科的内容,材料丰富,极具说服力,这不仅体现了作者具有较高的哲学素养,也充分体现了作者较为敏锐的理论洞察力。该书不仅是热衷哲学的学者非常值得研读的一部著作,对于从事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研究的学者而言也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

洪晓楠

2013年端午节于大连